

舒群文集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现代文学
书 名：舒群文集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7-88050-475-3/ I27
定价：10.00元

短篇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

“果里”

旅居此地的苏联人，都向他这样叫。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久了，他已默认了。虽然，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黑的头发，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对于异国的人，并不觉得怎样陌生。只是说异国的话，不清楚，不完整；听惯了，谁都明白。

蚂蜒河在朝阳里流来，像一片映光的镜面，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果里吹着号筒，已经透过稀疏的绿林，沿着一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于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门开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苏多瓦！”

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一句习惯语。

“果里，一月满了，给你工钱，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

“斯巴细（俄语，谢谢的意思）苏多瓦！”

也许有年轻的姑娘，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手向果里打招呼：

“可爱的果里，回来时，不要忘记了啊！”

“啊。是的，红的小花！”

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然后，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

“啊，列巴（面包），熟白汤（菜汤），斯巴细。”

于是，果里再走起路来，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他的嘴，忙动起来，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腮撑起一对大泡子。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牛在他的身后，已经成了群，黄色的，黑色的，杂色的最多，白色的只有一个，背上还涂着两团黑。小牛，有根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伸长它的颈，吻着母亲的股部，母亲摆起尾巴，极力地打着它。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让脸上所有能叠起皱折的地方全叠起皱折来；牛望着他，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

“果里！”

我们刚洗过脸，拥在展开的楼窗前，叫着他，丢纸团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

“不要！牛害怕。”

我们不听。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并且，弄起一阵恐慌，牛与牛撞着角。这使他的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

“我告诉苏多瓦去。”

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他也知道，我们对于苏多瓦并不怕，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还没有开始呢。

“我来念书好吗？也住大楼，也看电影。”

果里又同我说了。

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

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对果里说（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 CCCP（俄文：苏联简称）。”

“啊，果瓦列夫，CCCP？”

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

“果里列夫是中国人，怎么行呢？我是高丽人，怎么就不行呢？”

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

“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

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以后，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间，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觉得太无味，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蚂蚁河边的一条草径；那里是泥泞的，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镶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茵。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这块地方好像久已被人憎恶着，遗弃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草茎蔓过他的腰，搔着牛的肚皮，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他；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视着我们。

“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好让果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

我好像在教训果里沙，很严厉的。

“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那不是耻辱吗？”

“那么，安重根呢？”

我立刻记起来，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

一阵牛的哀叫声传来，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

“果里！果里！”

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赶一个号筒样，向果里喊，他会听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留意我们，他不睬我们。

不过，我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径被浸没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这次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恰好又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里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做路的标识。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头一摆一摆地，似乎艰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

我们吃过饭，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黄色的蒲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一堆一堆的，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另一面是无边际的远天连着地。散开的牛群，看上去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躺着的，吃

草的，追着母亲的……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牛的去向。我们的视线触着他，惹起他极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也许他会跑开，逃避我们。

“果里，我们给你气受了吗？”

我把他那深沉的头托起来，问他。他竭力把头再低沉下去，说：

“不是，绝不是的。”

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样美的不俗的好句子；而且，说得十分完整，没有脱落一个字音。不过，他的姿态太拘束，太不自然，似乎对陌生人一样地没感情。

果里沙还是原有的脾气，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苏联的。这给果里很大的耻辱；果里是容忍不下去，离开我们去给牛蹄擦泥水。

我们全在寂寞中过了许久许久，我才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问果里：

“牛蹄太脏了，你不怕脏吗？你擦它做什么？”

“就是因为太脏才要擦的。牛的主人是不允许牛蹄脏的啊！”

“那么，你为什么带着牛从河边走呢？我们宿舍门前不是很清爽的吗？”

我的话刚说出来，就又懊悔，说的不妥当。这不是对于果里加了责难吗？在果里的内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吗？

“我是不配从你们宿舍门前走的。”

他说得很快，他得气愤。

我说了许多话，是劝他仍从我们的门前走。实际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放牛的朋友。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并且，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红色与黄色的野花，全是他给我拾来的。这几天来，那些花都憔悴了，落了，我们看着瓶里仅有的花茎，谁都会想起果里来——果里沙也是同样的。果里却抛开我，再不在我们门前走过一次。

最后，果里允许在我们门前走的时候，我几乎痛快得要叫出来。不过，我还不肯信任，直等到他吹起归去的号筒。

暮色里的牛蹄，是疲倦的，笨重的。长久的日子，已经使它们熟识了从自己的家门走进。余下我们走向宿舍。宿舍的每个角落一片死静。我记起所有的同学已去俱乐部，去看电影。我看时钟还留给我二十分钟的余闲，便叫果里也去，他高兴地说：

“好，看电影去，我还没有看过一次呢。”

但是，在影场的门前，发生了极大的难题，这个守门的大身量的中国人，便坚持不许果里进去。我和他说了许多中国话，仿佛是让他给我些情面，他总是不放开这么一句话：

“他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

“你让他进去吧，我们的先生和同学全认识他。”

“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

果里不懂中国话，他很沉静地站着。

我的喉咙却突然热涨，对那个守门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

“他是我们的朋友！”

他装起像我父亲的尊严说：

“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

在灯光下，我和果里仿佛是停在冰窖里的一对尸体。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

“好小子，慢慢地见！”

现在，我晓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国话才那样气愤的吧！我问他懂中国话吗，他说只会那一句；一句我也高兴，好像为我复仇了。

不过，我一夜没有安静地睡，似乎有很大的耻辱贴在我的脸上。早晨我躺在床上，就听见果里一声声的号音从窗前响过了，远了；我没有看见果里。

在教室里，果里沙对我说：

“从认识果里起，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快做我们一样的学生。”

我想果里为了昨夜受的屈辱，故意给自己开心吧？果里沙却说是真的。我问：

“他和谁说妥的呢？”

“苏多瓦。”

这样我相信了。因为苏多瓦是我们班上的女教员。

“那么，他什么时候上学？”

“他今天去告诉他的哥哥，明天就来。”

我想，果里来了，坐在哪里呢？我们教室里只有一个空座位；而且在小姑娘刘波的身旁。她平常好和每个同学发脾气，小眼睛瞪得圆大的。如果果里坐在她身旁，一定不中她的意。明天教室里，除去我十七八岁，就算果里大了吧？最大的果里沙也不过十三四岁。并且，所有的书桌，仅是我和果里沙坐的比别人的高起些；只有叫果里沙走开，让果里坐在我的身旁。

放学之后，我在宿舍里正为果里安排床位，他来了；却是忧伤地。我问他快做学生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吗？可喜的消息，怎么换来了他的忧伤呢？我清楚地看了一下，他脸上还有泪滴。

同学的快来缠着他。

我问：

“你哭过了吗？”

他点点头，好像又要哭出来。

“你明天不是上学吗？怎么还哭了？”

“我才跑到田里去。对哥哥说，哥哥不许。”他的鼻尖急忙地抽动两下，又说：“你和哥哥商量商量吧。”

于是，我和果里到家去了。同学的等着这个有趣的消息，要我快些告诉他们。其实，果里的家并不远，转过我们宿舍的一个墙角，十几步便可以走进他的房子。来去只要五分钟，事情全可明白。不过，果里的哥哥在田里，没有回来，却是意外的。

时间空空地流过着。我并不躁急；因为果里的家里处处都是奇迹。房子小得像我们宿舍的垃圾箱。不过，垃圾箱里的垃圾也许比果里房里装的东西洁净些，贵重些，墙角下堆着污旧的棉衣；穿衣时，随着身子的动作将自然叠成的折皱展开后，还露出衣布原有的白颜色，很新鲜。

那边……

果里为我找出他一向保存着的好东西，我一样一样地看着；他两手合拢着又举在我的眼前说：

“你猜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用聪明的话暗示我，我也不明白；因为他讲的俄语太乱，所以终是没有被我猜中。最后他说：

“这里有爸爸，也有妈妈。”

是两个从像片上剪下的人头：男人是他的爸爸，女人是他的妈妈。然而我立刻发现极大的疑点问他：

“妈妈这么老，爸爸怎么那样年轻呢？”

“妈妈现在还活着；爸爸是年轻就死的。”

“死得太早了！”

我望着果里爸爸的像，我说话有些怜惜的意思。不曾想竟使果里的牙齿咬紧，很久才放出一口轻松的气息：

“爸爸死得太凶呢！”

我从果里脸上的神态也可以看出他爸爸确不是寻常的死。

“爸爸是读书的人，看，这不是还留着很好看的头发吗？（他指着头像给我看。）爸爸的胆子大，那年他领着成千成万的工人，到总督府闹起来，打死了三十多人，当时，爸爸被抓去了。三个多月，妈妈天天去看，一次也没有看见。妈妈不吃饭了，也不睡觉了。在樱花节的那天，别人都去看樱花，妈妈带着哥哥去看爸爸。这次看见了，在监狱的门口，妈妈差不多不认识爸爸了：爸爸只穿了一条短裤，肩上搭着一块手巾，肋骨一条一条的，很清楚，那上面有血，有烙印。妈妈哭着，爸爸什么话都不说。到爸爸上车的时候，总是喊着……看樱花的人追着车看，妈妈也追着车看……在草场上，拿枪的兵不许妈妈靠近爸爸。爸爸的身子绑得很紧，向妈妈蹦来几步，对妈妈说——你好好地看养孩子，不要忘记了他们的爸爸今天是怎样被——枪响了一声，爸爸立刻倒下去。……那时候，妈妈还没有生下我，这是妈妈以后常常讲给我听，我记住了的。”

他说的话太快，也太多；有些地方，我听不懂；也有他说不懂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完全明白。

“那么，妈妈呢？”我问。

“妈妈？妈妈还在高丽。”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说——我们不要再过猪的生活，你们找些自由的地方去吧！我老了，死了也不怕——五年前，妈妈到姨母家去住。我们来中国的时候，我才十岁。”

天黑了，他哥哥才回来。他说得很好的中国话，所以我们讲话很方便。他直是不许果里做我们学校的学生；并且他说的理由也是很多很多

“我种地太苦，唉，还不赚钱，也许有时要赔钱，你没有看中国年年有灾祸吗？你也知道吧？”

“我们吃饭全靠果里放牛的钱，到冬天又要歇工，好几个月得不到工钱。”

“我知道读书对他好。我是他的哥哥，我不愿意我的弟弟好吗？”

“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他可以去，我不用他管。家里还有母亲呢。每月要给她寄几元钱吃饭。

“唉，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们连家都没有了。”

我把他的话传给我们的同学，同学们失望了，但是很快地也就忘却了。

果里的号筒仍在唤牛群到草场去。

“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

我记住了这句话。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地升到旗竿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像什么光荣似的。

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竿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

于是，散乱的战争骚扰着，威胁着每个地方。不久，那异国的旗子，那异国的兵，便做了每个地方的主人。恰好我们住的地方做了战争上的大本营。戴着钢盔的兵一队一队地开来，原有的兵营不敷用，已挤住在所有的民房里。就是果里那个垃圾箱般的房子，也有兵住下。

我们照常上课。但是，果里的号筒不响了，牛群整天关在每个主人的院内，叫着，似乎在唤着果里。

“果里呢？”

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果里。忙向草场望去，只有一阵一阵的秋风扫着，把草打倒在地上。果里平常坐惯的那个土岗，被风扬起的土粒滚成一团一团的浓烟。我们想果里卷到浓烟里去了吗？等到浓烟散尽的时候，那里没有果里一只手，一只脚，给我们看见。我们想他在家里；可是，他在家里做什么呢？死静得好像连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我们同学的便会指说：

“看！少儿达特（俄语：兵）。 ”

接着就是：

“少儿达特杀了果里吗？”

“杀了，也像杀了老鼠一样！”

果里沙仍是对自己高傲，对果里轻蔑。我相信果里绝不像老鼠那样懦弱；果里沙却说：

“高丽人都像老鼠一样。如果不是，在世界上，怎么没有了高丽的国家？”这仿佛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语，他的小拳头在胸前击了两下又说：“像果里那样人，我不喜欢，不愿意同他做朋友。”

日子过久，谁也不再谈关于果里的什么话。又加天天到俱乐部去听演说，在时间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闲。这次苏多瓦怕我们太疲倦了，要带我们上山玩一次。

我们怕山上的蛇虫；有一次蛇虫毒伤了我们好几个同学。所以，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体操用的木棒，三十多人排成一列棒子队。

秋天的山，全是一片土与沙粒。已经不是夏天来时那样好看，可爱，什么都没有；只是土与沙粒打着我们的眼睛睁不开；上去后，只感到两腿很酸痛，秋风不住地搜索着我们血流中的温暖。苏多瓦为了我们的趣味，领我们向另一山角蠕动的人群走去。

那里，有许多的人：年老得胡子全白了的，年轻的，半残缺的，年

岁太小的。锄头、铁锹，斧子……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在山脊间已经成了一条沟壕；在沟壕里，我立刻看见果里的哥哥。

“果里呢？”

我正想问他，果里的面孔就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出现了。看来，他那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个放牛的果里；现在的果里是个小工人，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光着脚，身上穿着一件我们给他的破制服；他的颧骨高起许多，使眼球深深地陷进去，被埋藏在泥垢与尘土里。他靠着壕边，同壕一样高，很吃力地握着铁锹向外抛沙土。

“果里！果里！”我们喊着。

其实，他早已看见我们，只是故意地躲开。我们与果里的距离只有八、九步远，喊他自然会听见，他不仅不看我们，而且，把头移动向另一方向，更加紧他的工作。我走近两步，我看出果里是要和我说话的。他所要说的话，全埋藏在他的嘴角与眼角间啊。于是，我更大声地叫起：

“果里，我们来了。”

“果里，你在做什么？”

“果里，很久不见你了。”

果里没说话，只是在动作上给我们一个暗示，让我们向右边的大石头上望去，那里有两个兵安闲地吸着纸烟。然而，我们却不去顾他：

“来！果里。”

“来！来……”

惹起一个兵来了，站在壕的边际上；果里像失了灵魂一样死板。那兵用脚踢他的头；他的头仿佛有弹力地摆动两下，鼻孔有血流出。突然，他的铁锹举高，又轻松地落下，照样向壕外抛着沙土。

不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木棒都向那个兵做了冲击式。兵便比量着给我们看他肩上斜背着枪。

苏多瓦领我们回去的时候，果里的眼睛溜着我们，终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只有默祝果里最好不再遭到什么不幸。

第二天早晨。

“呀……呀……”传来了这尖锐的叫声，刺痛我们的心。

拍拍的声音连续地响着。果里在一只手两只脚下规规矩矩地躺在自己的家门前。脸贴着地，尘土从他的嘴角不住地飞开，像是新劈下的小树干。那兵的全力都运到这小树干的顶端，落在果里的股部，腰间。

“呀……呀……”

这声音给我的感觉，比小树干落在自己的身上还痛。

果里沙却切齿地说：

“该打，打死好了。”

我用眼睛盯住他，表示我对他的话极愤恨。他又说：

“果瓦列夫，你看果里，那不是一匹老鼠一样吗？”

以后，果里真像一匹老鼠，跟着佩刀的兵，常从我们宿舍前来去；他独个人的时候不多。这使果里沙更看不起他，骂他，向他身上抛小石头，伸出小拇指比量他……果里沙想尽了所有的方法欺辱他；他却不在意。

有一天，我们快就寝的时候，果里跑来。果里沙的手脚堵塞着门，不许果里进来。

“你还有脸来吗？你不要来了。”果里沙说。

“我找果瓦列夫！”

“果瓦列夫都会替你羞耻。”

我看出果里是有什么迫切的事情，不然，他的全身怎么发抖呢？我给他拿来几片面包，他不吃。我问他这些日子怎样过去的，他也不说。仿佛所有的时光没有一刻余闲属于他，很迫忙地说道：

“借我一把刀。”

“做什么？”

“你不要问。我有用途。”

我在衣袋里把平常修铅笔的小刀拿出来。他说：

“太小了！”

“你要多大的？”

他用两手在床上隔成他所需要的刀的长度，我便把我割面包的大尖刀给他。他还用手指试验着刀锋快不快。然后他高兴地说：

“好！太好了！”

他临走时，告诉我：

“那些‘魔鬼’明天早晨去苇沙河。”

果然是去苇沙河，果里房脊上的旗子没有了。一队一队的兵，骑马的，步行的，沿着山路走去。只有几只小船是逆着蚂蚁河划下；船上的兵仅是几个人。果里就坐在小船上，为佩刀的兵背着水壶，食粮袋。我们守门的那个老头子，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时，就起来去看，这些话就是他讲给我们听的。

过后，守门的老头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在一口气里又冒出一串话来，说是果里投河了。

先是一个打猎的外国人看见的——有个孩子顺着蚂蚁河漂来。于是他投到水里把孩子拖上河边，用人工呼吸方法换来孩子的气息；喊了几个人来，守门的老头子也在里面，他认识出了那个孩子是果里。

我们去的时候，苏多瓦也在那里，另外是别班里的同学。果里躺着不动，衣服贴紧在身上，一滴一滴的水湿了他身旁很大的一块地方；他已经没有了知觉；虽然，他嘴里还嚼着不清楚的话。大家正在互相询问果里投河后的情形，我们学校的铃声叫我们立刻回去上课。只有苏多瓦还留在果里的身旁。

今天，苏多瓦告诉我们，在我们这班里有一个新来的学生。每次有新来的学生，苏多瓦都是要先告诉我们的。每次也就打听出这新来的学生是升班的，是降班的，是从外埠新来的。不过，这次却是例外，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新来学生的底细。

距上课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们便随便地猜扯起来。男生说，新来的学生是好看的姑娘，最好和自己坐一个书桌。女生说，新来的学生是猴样的，这样弄得每个书桌都叫响着。

门突然地开了，教室里立刻静下来。我们悄悄地跑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装做整理着书本，修铅笔。是因为我们闹得太厉害，苏多瓦来了。然而，不是苏多瓦。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果里。他穿的同我们一样：黑皮鞋，黑的裤子，黑的卢巴斯卡（俄语：衣名）；胸前也有两个小衣袋，装得饱饱的，书夹里放着一包新书。他张大着嘴，像是有许多要说的话，

想在一句话里吐给我们，可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

在午间，很快吃过饭，我们聚拢在一起。我问他：

“现在，你高兴了吧？”

“我不是骗你，我真不高兴。”仿佛仍有极大的恐怖，痛苦，留在他的眼里。“苏多瓦待我太好了。给我养好病，又送我到学校来。你们看！”他指尽了他身上所有的一切给我们看。

当我问他为什么投河的时候，似乎他的脑里又复活了一幕死的记忆。于是，像给我们背诵出几页熟读的书：

“忘了是哪一天，‘魔鬼’告诉我，他们要走了；要我的哥哥去，还要我去。我知道去了就没好，我想爸爸在‘魔鬼’的手里死了；妈妈怕我们再像爸爸一样，才把我们送出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来。谁想到这‘魔鬼’又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攫住我们，夜夜都没睡觉，哥哥望着我，我望着哥哥，不敢说话……”

“和老鼠一样！”

果里沙冲断了果里的话。

这时候，果里不像个孩子；孩子没有他那样沉静的姿态。他继续说下去：

“那天，哥哥跟着走了。我还跟着那个带刀的‘魔鬼’（他的眼睛，好像在询问着我们看没看见过他说那个带刀的‘魔鬼’，我们向他点着头）。船上除去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船夫，‘魔鬼’正用铅笔记着什么，我心跳，跳得太厉害了——你们猜我想做什么？”

“想投河呢！”我们许多人同样地说。

然而果里沙突然地跳上书桌，把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弄散乱了。他轻快地说：

“你们说果里想投河，我看太不对。你们知道吗？河里有老鼠洞。”

“在河里，一共是三只船。两只在前边，我们在后边。前边的船，走得才快呢！没走到三四里的时候，离开我们有半里多远。等他们拐过老山头，我们还留在老山头这面。我只觉得一阵的麻木，我的刀已经插进‘魔鬼’的胸口。然后，我被一脚踢下来，再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把头转向我问：“你知道哪把刀？是你借我的啊！是你借我的啊！”

“好样的，好样的，”果里沙抱住果里又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果里搬到宿舍来，除去苏多瓦赠给他的毛毯之外，再什么都没有。果里沙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他一半，并且，在贩卖部内给他买了牙刷，牙膏，袜子，毛巾，小手帕……费用全写在自己的消费簿上。

此后，果里，果里沙，我们三个人成了不可离散的群，有时缺少一个人，其余的便感到不健全。每天我们都是在一起，到河边去，到俱乐部去，到车站的票房去，到许多人家去看果里以前所放的牛。他还认识哪个叫什么名字，哪个牛有什么习惯，平常他最欢喜的是哪个，最讨厌的是哪个——由牛群给我们讲出许多的笑话。

在冬天，果里学会滑冰，便成了他的嗜好；可是，我们不许他常去冰场。因为那时街头又满了果里所说的“魔鬼”和“魔鬼”的旗子。不过我们学校的旗子，仍是同从前一样——一半中国的，一半苏联的。

只有那半面中国旗，我爱啊；可是，果里为什么也爱呢？我们每天望着，仿佛在旗上开了花。然而花，毕竟要有谢落的一天——校役给我

们看了一面新做的旗，一半是苏联的，黄色的小斧头，镰刀，五角的小星星，在旗面上没有错放一点的位置，但是，另半面却不是属于中国的了。那全新样的，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校役悄悄地吧旧的旗子扯落，升上新的旗子。

我们天天仍是希望把旧的旗子升起，哪怕这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可是，我们总失望。只有扑到储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丢在墙角下的旧旗子。

不久，更有惊人的消息传来。我们学校的旗子快完全换新样的了。

我请两点钟假，到叔叔家去；回来晚了。苏多瓦正给我们同学的讲什么，她停下，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迟，我说：

“这地方不安宁；叔叔把祖母送走。祖母留我吃了饺子。”

我说完，苏多瓦完全没有谴责我，真是意外的。她又继续她的问话——问每个苏联学生将要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学生好像喊了一个口号：

“回祖国去！”

“果瓦列夫，你？”苏多瓦又问。

“回祖国去！”我说。

“怎么回去？”

“叔叔回来接我。”

苏多瓦从讲桌来，走近果里的身旁问：

“果里！”

“什么？”

“你呢？”

“……”

果里咕噜两声，说不出什么。他只是呆着，在呆望墙上悬着一张世界地图。在那地图上，靠近海洋的一角，有他的祖国，仍涂着另一种颜色区分他祖国的边疆；但是他说：

“跟果里沙去吧！……”

苏多瓦做出孩子一样的讽刺，手指点着果里的头；果里的头渐渐地沉重下来。她立刻又严肃地说：

“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

为了明天的别离，苏联的同学分赠我与果里许多小物品，做纪念。

“果里呢？”同学的问。

我在院里寻到果里。只是他一个人，在树影下踱着小步子。月光浮在他的脸上，我看见有泪珠。他不住地问着自己：

“到哪里去呢？”

最后，我告诉他：

“我俩一同走吧！”

于是，我们送别苏联同学登上驶向祖国的专车后，便筹备起我们的行程。虽然，已经知道南线车轨被破坏（这是叔叔必经的路），但是，我们仍倚在门前，望着邮差来。那许多信，没有一封是叔叔的；都是从苏联来的。同学的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有许多人欢迎他们；以后，又送他们进了学校……

十几天了，叔叔的消息完全没有。而且守门人天天催着我们走，大

门立刻要锁起来的。守门人为了我们没有路费，在旅程上给我们个秘密的方法。

于是，坐过一天一夜的火车之后，我们又飘流在海洋上了。

虽然我们是藏在货舱里，被塞在麻袋的缝隙间，不住地有老鼠从我们头顶跑过，但是，不停止的轮机似乎在告诉我们：

“向祖国去的孩子们！不要害怕，不要叫饿，这一刻你们应当忍受的！”

我是十分安心，果里却问：

“在岸上被检查了，下船也要检查吧！”

“检查怕什么！”

“你是不怕的。我呢？”

我们同是说着俄语，仿佛忘记了我们是异国的人。为了果里的安全，不应当再说俄语，要说中国话了。所以我改用中国话说：

“从现在起，我们说中国话吧。”

“如果有人问是哪国人呢？”果里仍是说的俄语。

“说中国话，自然你要说是中国人啦。”

“说不好！”

我开始试验他了：

“你是哪国人？”

“中国人。”

是不像中国人。他说话的重音，放在“人”字上。其实，我和他说中国话，他明白，不过，他说的太不中听。

“你装中国人，装我的弟弟。我说话，你一点不要说！”然而，下船的时候，警察偏偏地问果里：

“你怎么不说话，你哑巴吗？”

终于果里被看出是高丽人。果里所说的“魔鬼”，这里也有的；于是果里又被“魔鬼”抓了去。他看我也被一只大手抓住衣领。他说：

“我是高丽人，他不是的。”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

沙漠中的火花

在内蒙古边区上的一个小地方，以前没有人详细调查过究竟有多少住户；可是旅人都记得那一系列一列的蒙古包，硷土堆起的小泥房院落；并且有一所极大的兵营；所以从兵营看来，常使人想到驻兵的数目，要比住户多在几倍以上，而且是中国兵，虽然那里是蒙古的地方，蒙古的居民。

经过几个月的炮火熄灭后，那里处处都变成了一片烧焦的土粒，细碎得已经辨认不出是瓦质，是硷土，是砖面，或是其他一些什么东西；总之，与这里的沙漠混卷起来，也正像沙粒一样。不过，也有几块完整的砖块，未燃尽的板扇……以及散落在各处的无数弹筒……那早已被人拾去了。遗留下来的，也只是散落在边角上的几所倾斜的小屋，孤零的墙壁，已经经不起任何力量的摧毁，甚至一指的触动，也许在天气突变

的一天，被一阵暴风卷尽了。卷到哪里去了呢？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因为那里只余下些露宿着一团惊得失了知觉的老太婆和不中用的孩子，此外，全是新来的异族军队，不是中国的，他们自称——“大军”。

自从枯燥的地面遭了雨淋的那天，有一张新布告在一面半截的墙角上贴出之后，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些壮年人，穿着破旧的衣服，每个人都束紧一条腰带，腰带的色调很新奇，似乎在买的时候，经过了一种选择，特意来配合自己拖到地下的长袍，每个人都带着与自己头顶一样大的半球形的毡帽，有的，镶着素色的细边；有的，恰在帽顶上绣了一朵团花。每个人都企图挤到近布告的前边；可是谁也不肯让出一个空位置使自己面前再加多一个人。所以只是一个推拥着一个，不住地涌向前边去，又涌向后边来，好像海风卷起的浪头。

“喔——喔！”

渐渐地近了，仍是：

“喔——喔！”

野兽一般的鸣叫，突然，使每个人把头转开去，立刻又转过来，他们互相地望望许多人同样地说了一声：

“阿虎太又来了。”

虽不是野兽，但是，这个阿虎太的肢体，确极相象野兽那样的粗大，蠢笨，黧黑——他深陷的两颊脱出去的那个嘴的面孔，恰与猪头仿佛，而且，并不比猪头聪明些，或是纯白些。他就是摇动着那个笨重的头，渐渐跑到布告前的人丛边。他全身的衣服与别人不两样。然而他的吼声，在别人的耳旁响来，比兽叫更要震动耳骨而发抖起来。

“喔——喔！”

“他妈的！”

人丛稍稍飘动一下，在那种低低的咒骂声中，有厌恶，也有恐惧。

阿虎太把一个大拳头举起来叫：

“喔，散开些！”

于是人丛间自动地裂开一条缝隙，让阿虎太走进来，然后又缝闭了。

他站在最前面，脸皮已经快触到布告的纸张，摆摇着划断了许多人的视线。许久他又把身子尽量转过来问：

“什么事情？”

“不会自己看吗！”

有人这样回答，使阿虎太暴躁起来，说：

“你不知道我不认识字吗？”

“知道你是谁！”

阿虎太下垂着的右手，手指渐渐地卷曲起来，合成一个牢牢的拳头，伸给与他对话的那个人。于是又有人伸出两只手握住他的拳头，慢慢地给他送回身旁，等到他手指伸开之后，拍拍他的肩说：

“得了，我们的英雄！”

阿虎太立刻吐出一口笑声，注视着说：

“啊！是你啊，是萨达尔图啊！”

“你还认识我吗？”

“怎不认识！”

“怎么认识呢？”

“得啦，老朋友啦，怎么不认识呢，不是几个月前我们打过一架吗？你忘了吗？天快黑的时候。”

“好记性！好记性！”

“我都记得啊。让我看看你的手吧！”

阿虎太把萨达尔图的左手拖起，拖到自己的胸前寻视着，寻尽了手背，手心以及手指的夹缝，终于没有寻出什么来。他的眼睛刚刚向上翻动了两下，立刻又扯出萨达尔图的右手来，在腕骨上有着一条极大的疤痕，新生的皮肉没有补满疤痕的缺陷，周边仍凝结着血丝。他轻轻地用手指摸试一下，却使萨达尔图怪叫一声，所有的人都起了一阵小小的惊奇。他的脸色突变成紫红之间的一种颜色说：

“我对不起你，我不该用刀子啊！”

萨达尔图沉静下来，一直许久才问：

“你从哪里回来？”

你从哪里回来？”

“我先问你！”

“白庙子。”

“你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你看看还能做什么呢？好好的日子不让过，他妈的，偏来打仗——”

萨达尔图的手掌贴住他的嘴，好使他不再吐出话来。但是，他把头摇开，仍是说：

“怕什么，谁敢不让说话！”

“忍耐些，你这阿虎太。”

“耐忍呢，住什么？吃什么？”

于是，萨达尔图给他读起布告来。

布告上说是什么顺天安民——什么想造东亚乐土——所以注意建设，招募工人，工资由三角至一元，——那全是蒙文写的，不过最后的年月日上有“昭和”两个字。

时间已经是下午，涌动的白云间，没有一丝阳光流走着，仿佛在这抢夺的世界上，太阳也被人抢夺去了。

人丛渐渐地散开。

又渐渐地集合起来。

不过，那是在另一个地方了——没有房屋，也没有院墙，只是一座未被轰毁的门洞，并不怎样高，却很少有那样长，长得像一条夹道。那是不知曾遭受过多少弹粒，两面墙壁上遗下无数未穿透的细孔。

但是，以前所涂下的白粉，粉上的蓝色字迹——天下为公——去除一字模糊了，余下的，仍是看得很清楚。由门洞的两边引开四条麻绳，引长到七八百尺的顶点连成两条，被钉在许多距离相等的木柱上，让中间围住了一个极大的圈面，以及许多军用的帐篷，给养，辎重，炮车，慰劳品……人丛也就是在那里集合起来的；因为人数太多，很难看出比在布告前是增多些，或是减少些。不过阿虎太与萨达尔图确是来了，而且在一处踱着，谈着：

“我想劝你几句话——”

阿虎太没等到萨达尔图说完，便反问一句：

“什么话？”

“你肯听吗？”

“肯的！肯的！”

“你是知道的，这些兵比狼还厉害，你不要随便发脾气，那与你的性命有关啊！”

“啊！”

“你肯听吗？”

于是，野兽自动地顺从了。萨达尔图又说：

“忍耐些吧！”

“你总是忍耐，忍耐；忍耐什么？”

“我们为了吃饭才要做工，也就要忍耐啊！”

“不知忍耐多少辈子啦！难道叫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得忍耐吗？忍耐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这个也来管我们，那个也来管我们，把我们弄成木头人一样，将来一定弄成死人一样啊！你信不信？”

“我们——”

“我们总要有一天——”

萨达尔图触动着，使他的话中断了；处处散布着的哨兵，有两个走近他们，虽然他们的话是哨兵所不懂的。

他们同别人一样，望望四野，望望自己身边所有的陌生景色……像铁钉一样地接触着陌生的面孔；有时，也像在风里飘散的柔丝。当他们所有的人看见从帐篷里走出一个配皮鞘战刀的军官的时候，便赠给他一个公认的绰号——“小狼”。其实，狼也没有他眼睛那样狠毒。

“到这里来报名！”“小狼”喊着。

他说的是蒙古话，由于字音的准确，声调的熟练，使不看见他的人，绝不会想到他是在说着异族的话。

他一面望着每个人，似乎从皮肉望进骨子去；一面又在问着每个人的名字，然后用笔记在—本簿子上。

最后“小狼”哈哈地笑了笑；便指点着他写下的名字，检点他们的人数，共有一百二十九名，他又从帐篷里唤出八个人参加进来。他说：

“这里有几个中国人，也是同你们一样的工人。他们跟我们的军队太久了，比你们能多知道一些，要听他们的活才好。总之，你们大家好好在一起做，有事不妨大家商量。”

这几个中国人，没有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他们上身是杂色的西装，下身全是一色的马裤。虽是短小的肢体，却异常的高傲。每天指示着蒙人的工作。有时一同谈起话来也很和气，意思是常想问出蒙人的内心话来。

不过阿虎太不在意他们，同他的伙伴们一样，整天听从着所指定的工作，把堵塞着各处的砖块，泥土，废掉的一些杂碎东西，一筐一筐地装满起来，或是别人给他装好筐子，由他的一条扁担掬起来，由院内掬到院外四五十步远的地方，不象别人还要把腰缩短些，好让两筐稳稳地落地，然后，再把筐里倾倒出去；在他只是停住一步的工夫，两手先握住系着筐子的一边绳段，把两肩向上一耸，两手也伴随着提高起来，立刻抖动一下，便是空筐了。他掬起三次的时候别人也只有两次。所以“小狼”不停地挥打着的皮鞭，没有落过他的身上。而且，“小狼”招集工

人训话的时候，常常提出阿虎太的名字，给大家听，让大家与阿虎太一样加快工作的速度。

此后同伴中就有许多流言传出来，最难听的是——

“阿虎太甘心做外国奴。”

因为这一句话，阿虎太与同伴们起过许多次冲突，有一次甚至打起架来。每次都是萨达尔图阻止他；他起始不肯听，终于使萨达尔图说出最后的一句话来——

“你肯听吗？”

——这样他才垂下头，不再去与人争辩一句，如果他握紧了拳头，那时候，也松开了。而且常在晚间会对萨达尔图说——

“我肯听吧？”

“我的好朋友。”萨达尔图许久了这样叫他，然后又继续着问：“你做工，怎么这样卖力气？”

“我惯了，向来就是这样，不这样，这倒不舒服。像他们骂我，我真冤，你想，我怎么甘心做外国奴？”

“朋友，你应该着重他们。你想想，你做得越快，皮鞭子在他们身上不是落得越多吗？”

他们几次这样谈话的，最后一次，阿虎太终于答应了，对于工作尽量减慢下来。萨达尔图仍是问：

“真吗？”

当他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发觉身后有一个中国人倾听着，又仿佛是在监视着。可是他们却不留心，而且阿虎太更放高了声音说：

“你看，明天！”

第二天确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刚刚睡醒，躺在沙地上尽量地把他们占有的空闲时间延长些，舒展舒展太疲倦的肢体。那时候，就有两个哨兵闯近来，先叫了萨达尔图的名字；然后逼他立刻到一个帐篷里去。他停了一些时间仿佛有几句话要询问的；但是没被允许便把他拖去了。

几分钟内，大家也骚动过一阵，有人主张，大家一同冲进帐篷，把萨达尔图夺回来，有人主张，去指问萨达尔图究竟违犯了什么事情——，引起哨兵步枪注视之后，大家的喉咙便是断尽了弦的弦琴了。

阿虎太一个人走开些，在距离十几步的地方来去地踱着。他抛出的每一个步子，都是沉重地落下，使地上的沙土留下他深深的脚印。

早晨的风，仍是清冷，一阵一阵地飘走着，给他们带来萨达尔图的消息——在帐篷里的声音：

“你说！”

“什么？”

“是你说的不？”

“不不！”

停止了追问的话，便传来了萨达尔图的叫喊，一声比一声低降下来，在不断地呻吟着：

“留情啊！——你们是强国，你们是文明的国家啊！——留情吧，——你们是强国，你们是文明的国家啊……”

“你说！”

“说啊，说啊……”